

序

王鹤寿

刘宁一同志逝世时，我在深圳，无法赶回与宁一同志见最后一面，深为遗憾！深感痛楚！转眼间，宁一同志离开人世一年有余，忆及我与他的“难友”、战友之情，即引起深切的怀念。

宁一同志和我是 1933 年 8 月在北京的同一地址同时被捕的，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们党争取全国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又同时出狱。

我们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当时国民党一方面“围剿”苏区红军，一方面使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宪兵第三团的团长是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是专门为了破坏北方的共产党活动，由南京派来北京的。这个宪兵第三团在北京是“独立王国”，不受国民党北京任何最高军政机关管辖。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大肆搜捕一切革命组织，甚至大专院校稍有革命色彩的学生、反帝同盟的会员等等都要逮捕。当时北京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北京的党组织与共青

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和宁一同志在我们同时被捕之前，并不认识，只是因为同一天到已经被捕的北京共青团市委张承钧住处时同时被捕的。被捕后，在宪兵第三团，我亲自见到他受刑时坚贞不屈，这使我确切认识到宁一同志具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气概。当然，我被审和受刑的情形他也亲自见到。这样我们之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同志之情。

出狱后的几十年间，我同宁一同志不断有所接触，在延安期间及全国解放后我们常交往谈心，同志感情甚笃。我知道他在党内做过党组织、工人运动、外事、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取得许多成绩，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同时，我深知宁一同志是心胸豁达，思想政治坚定，具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人。

宁一同志退居二线后，虽然年老多病，仍然奋发有为，亲自写下了自传性的《历史回忆》。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把它连同宁一同志过去写的文章编辑出版，这是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历史回忆》的问世，无疑提供了一段时间内的党史资料，同时，对学习宁一同志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大有教益。

1995年8月

刘宁一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刘宁一同志，因病于 1994 年 2 月 15 日 9 时 44 分在北京逝世，终年 87 岁。

刘宁一同志，1907 年 12 月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史联甲。1924 年考入直隶第四师范学堂。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25 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7 月任中共满城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29 年任中央唐山煤矿林西区书记。1931 年在顺直省委组织部工作。同年 4 月在天津被捕，1932 年 1 月取保释放后赴唐山，任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年 7 月第二次被捕，1933 年 5 月被释放。之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3 年 8 月第三次被捕，后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判刑 12 年。“七七”事变后，经我南京办事处交涉，于 1937 年 8 月释放。刘宁一同志曾三次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从南京出

狱后，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任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江苏省省委委员、工运部部长、保卫部部长。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长期在唐山、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事工人运动，为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宁一同志 1943 年 7 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 年后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参与总结了党的城市工作经验，参与了党的“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1946 年后，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解放区工会联合会筹委会主任，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以参加国际工运为突破口，走向世界的指示精神，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经过对“中国劳协”深入细致的工作，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的统一，受到党中央的嘉奖。刘宁一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长期致力于国际联络工作。1948 年后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我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的工作，向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在欧洲工作期间，刘宁一同志积极主动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接触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人、知名人士和群众代表，并对华侨工人、海外知识分子作了大量工作，扩大了我党在海外的影响。1948 年 8 月，在中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国际

联络部部长。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刘宁一同志曾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代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刘宁一同志团结广大工人，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改善工人生活，保护职工权益，为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及国际联络工作，为全国人大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刘宁一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大会理事，他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55年至1965年以中国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60年，刘宁一同志作为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1964年曾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五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宁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

回到北京。1979年7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顾问，中共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坚持原则，为推动统战工作、经贸工作、纪检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1984年刘宁一同志退居二线后，任全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校长，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大量工作。他的著作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主编之一）《欧行漫记》、《与青年工人谈心》等。

刘宁一同志曾被选举为第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宁一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刘宁一同志为人谦恭和蔼，平易近人，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作风民主，为人耿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刘宁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历尽艰辛，英勇无畏，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老党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刘宁一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人民日报》 1994年 3月 5 日）

历史回忆

第一章 故乡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边，七华里以西便是连绵的大山。山区是比较贫困的，但我小时候却认为它很富裕，实际上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河北省满城县里，这个叫作南马村的小村庄是相当贫穷的。

在我们村庄里，只有 30 多户人家。和相当多的村子一样，我们村里以一个姓氏为主，外姓只有两三家，村里头我家辈份最高。在我小时候，家境尚好，有土地 70 亩，拴有一马一驴，全家父母兄弟 9 口人住在有 12 间房的四合院里。现在看来，算是一个富裕中农家庭吧。

我的原名叫史联甲，后改名为刘宁一。我出生于 1907 年 12 月。我的父亲史恒顺是一个欢喜发号施令的人，在族中受人敬畏，也得罪了許多人。母亲史康氏忠厚和气，与村人关系很好，然而受父亲的欺侮很厉害，经常是父亲在外面生了气，回家来便打烂东西，母亲也免不了挨打受气。我从小就看到家里打架争吵，对这个家

庭没有什么好感，而我们全家也都害怕我父亲这个封建家长。

我们村距保定有 35 华里，消息比较灵通。多少年来，也正是因为距北京大道较近，所以捻军、义和拳和八国联军都曾从村里经过，军阀混战的灾祸，往往也不能幸免。天灾人祸，累累重负，都压在穷苦百姓头上。

我小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河北的军阀首领是曹锟，手下军事首领是吴佩孚，吴佩孚打段祺瑞，称为直皖战争；也打过张作霖，叫作直奉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吴打胜了，他便以直鲁豫为中心，向南方发展，大有以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军阀混战时期，每次战争，都有很重的赋税，向村里派粮草、派民夫，还要出兵。粮草是经常征收的，有时候，一个月之内就征好几次粮草。因为一月内村庄已几易其主了，遇上村长正直一些还好，若是为虎作伥，那就交得更多，因为那些坏家伙还要从中渔利。

军阀混战，不管谁输谁赢，倒霉的终归是老百姓。我们家虽是中农，日子也不好过，经常负债百余元，那些一般贫穷人家的日子可想而知了。特别是 1920 年大旱，华北普遍受到蝗灾、旱灾。5 月的一天里，蝗虫突然飞来，天空都变得阴沉起来，蝗虫一下子落在地里，待它们飞起，地里已是光秃秃的一片了。立时，大部分人家陷于饥饿状态。我还记得，有一家人因为没饭吃而活活饿死，

有的逃荒去东北。灾荒来时，高兴的只有大地主。这是他们借机吞并土地、放高利贷的好机会。

听老一辈人讲，我们村里历史上也有农民起义。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太平天国时捻军经过我们村庄的情形。他们还记得太平天国的旗帜。后来，八国联军占领保定后，在我们村里也作了不少坏事。当时，一些农民在大山里与这些帝国主义者对抗，反抗外来侵略，但终因清政府步步退让，农民的反抗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帝国主义虽然撤出去了，经济上的侵略却日益加重，一直侵蚀到农村。我们孩提时说的就是：洋火、洋灯、洋面、洋糝米。凡加洋字的，都是外国货。至于民族工业，没有什么发展，洗衣皂叫洋胰子，连钉子也叫洋钉，到后来中国纸都没有销路，用“洋纸”了。

当地政权是由豪绅把持，而传教士权力很大，传教士甚至有支使县长的权力。豪绅们与军阀、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互相利用。我们县最大的绅士叫杨东川，前清举人。经绅士们串通，他成为河北省议员，不久又成为国会议员。曹锟贿选当总统，他投票支持。当时，地主豪绅是军阀的社会基础，军阀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无论大小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就这样，形成了一种相互勾结的局面。

由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我们乡村的压迫，也因为看到了黑暗现实，普通农民一听说洋鬼子，就切

齿痛恨；提起豪绅地主，就知道是一帮坏家伙。像四五十岁的男人、老太太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则不断地将这些事讲给小孩子听，因此我们很早就知道了洪秀全、太平天国、义和拳、日本鬼子、俄国沙皇等等。历史事实教育了人民，看到了前人怎样英勇牺牲，怎样不屈地斗争，慢慢地，我也朦胧地知道了这些，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念书了。

第二章 初进学堂

在我小的时候，农村里最初是没有学堂的，只是村里请一两位老先生开私塾，教教《三字经》、《百家姓》、《大学》、《论语》之类。后来政府明确各村必须办学堂，可人们并不欢喜学堂，称之为“洋学”。

我能够上学，实在是很偶然的，是“顶替”的。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常听父亲谈起家中几代没有识字之人，甚为不便。后来，父亲便将哥哥送去读私塾。哥哥的性格同父亲相仿，骄傲、欢喜自吹，不喜欢读书，经常逃学，过了些日子，竟逃到我一个亲戚家去学织布，再不念书了。然而，学费已付是不能讨回的，于是，方才还在光着屁股玩耍的我，一下子变成了小学生。

上私塾时间不长，前后读了两年半，先生却换了两个。第一年是老脑筋的儒学先生，60多岁崇尚体罚，曾

将一个学生的头打了一个洞。村里人对他很赞赏，说他负责任。我第一次挨打，是放学后爬墙乱吵，先生将我们召回，每人打 10 板子手心。学生很讨厌他，谁也不愿上学。第三年，换了个前清秀才，比较开明，他搞改良，想研究个办法比学堂学得还好，要学生念学堂的课本，教我们白天背诵，晚上给我们讲解，四年功课一年读完。后因先生病故，私塾解散，我就去学堂读书了。

学堂是附近 4 个村联合办的，在一个大庙里。学堂里改用课本，教学方法也有些变化，过去是念而不讲，现在也讲解课文了。课文呢，是新旧掺杂的东西，在忠孝仁义、修身养性之外，加上倡导富国强兵的思想。但是当时军阀打仗，国家越来越穷，洋货越来越多，国不为国，家不为家，学了这些理论，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后来，由于闹蝗灾，学生和先生都忙于打蝗虫，学堂停办了。

1921 年，我 14 岁，改上了县里的高级小学，相当于现在五、六年级。这是县里最高学府，学校也是办在寺庙里，不过是在县城里。学校里用的是近代课本，算学、图画、音乐都有了。教员多是保定第二师范毕业，但是，教育的思想还是以封建教育为中心，加上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忠孝节义与富国强兵并行提倡。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其深远影响是无可限量的。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股新思潮，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观

念，它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时，保定有不少学生在北京念书，特别是一些小学教员深受其影响。因此，在我们学校里，教员分为两派：一派以校长为中心，主张严肃纲纪，学生必须循规蹈矩，认真读书。他们对学生管束很严，连睡觉也要监督。校长为树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绞尽脑汁，这一派占绝对多数。另一派多为青年教师，受“五四”运动影响，宣传爱国、民主、反帝、反封建，强调独立、平等、民主、自由，向学生们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杨的教员，名叫杨耀寰。他订阅《觉悟》、《新青年》、《学生杂志》也给我们看这些杂志讲科学、讲社会主义、讲民主自由，反对封建，讲陈独秀的革命故事，帮助学生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等等。这时，我们才知道世界上有公历，有个 1923 年，知道了法国勤工俭学，知道了俄国革命和共产党。我们那时喜欢读的是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要爱国，要革命，这已成为我们的愿望，但如何干法，杨教员自己也没找到办法。我们也曾想闹学潮，反对校长排斥进步教员，但由于反对派告密，学潮流产了，我们也被记大过一次。不久，杨教员因与校长不和被解雇了。

转眼间我高小毕业了，这已是 1924 年了。我想继续读书，但家境渐衰，于是便投考师范学校，因为上师范学校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发制服、发书本。结果这

年的下半年，我考上了邢台的直隶第四师范学校。

第三章从“五四”到“五卅” 时期的学校生活

“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首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扩展到全中国。在河北省，从北京到河北几个师范学校和中学，新文化运动思想很盛行，主要是救国运动、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思想。那时的口号是“走出象牙塔，来到十字街头”“到民间去”；另外还有“社交公开，恋爱自由”等等。有的青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SY”。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也已经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

1924年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这就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倒戈打败吴佩孚后，与广州取得联系，组成了国民革命第一、二、三军。在南方，广东已成立国民政府，实行国共合作，大革命已经开始。

这个时候，北方学校里思想相当活跃，即使旧时教员，也不像从前那样要求学生死读书，他们允许、有时自己也参加爱国活动。在社会上，进步书籍《语丝》、《向导周报》，以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可以读到。我也是从《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中看到什么是共产主义。在阅读进步书刊活动中，我同黄柏果更加接近了。他是宛县人，和我是邻县，我们是一同入学的。

时，学校每逢“五·七”国耻日便放假，学生们上街宣传，反对二十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地，群众运动扩展到全国各行各业，自 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在铁路、矿山、海员以及纺织厂里都有发展。

革命形势喜人，进步书刊可以公开征集订户，学校里学生们可以自由结社，学校也允许这些组织存在。像我们学校就有文学研究会、英文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社团。说到社团，不能不谈谈我们的文学研究会，那是 1925 年上半年，由我们几个同窗筹建的，开始只是十几个人，后来发展到六七十人，大家选我作会长。我们经常集会、发表文章，批评对象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内战。

这一年的 6 月，从上海传来“五卅”惨案的消息，学校里全体学生停课，上街游行示威，部分教员也参加了。同一天，第十二中学、第三女中也参加了。我们的口号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抵制日货”。学校当局见形势难以控制，又不敢阻止，便提前放假，学校放假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回到县里后，将运动推向了农村。我回到县里后，找了几个共产党员和团员一起募捐，在集市里进行宣传。县里虽有些绅士，不赞成这些活动，但也没有阻止。经过这场运动，到了开学时，形势更好了。这一年 9 月，王福堂、冯温介绍我加入共产党，11 月被批准，我们几个同学建立了共产党

支部 我们支部有 6 个人，成为学校中学生运动的核心。也正是在支部推动下，成立了学生会，这时我又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现在看来，有些是很好的，如推动改善伙食和调整宿舍，组织演讲；但也有些斗争虽然胜利了，看来，却是不大妥当的，例如反对学英文（当然这也有民族情绪在里面，斗争结果减少了 1/3 的课时），强迫教务主任签字准予停课演戏等等。

革命形势继续高涨，李大钊等革命同志的英勇就义，更鼓舞革命青年奋勇前进。当时学生思想是很活跃的，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便是“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人究竟为什么而生活？”北京就展开了所谓“人生观的论战”。陈独秀、李大钊、丁文江主张人生是科学的、唯物的；另一派张君勱、张东荪等则主张人生是唯心的、精神的；折中派是梁启超。还有无政府主义一派，以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主张什么也不为，只为真善美。论战许久，出了一套书叫《科学与人世观》。由此可见，人生观、宇宙观问题已经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同时，广东革命影响越来越大，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北方，在北方，也组织了国民党。河北省是共产党帮国民党建党的。此时，共产党人参加他们的会议，国民党人认识了我们的的人，后来，国共分裂，这一点却成为祸根。在入党问题上，一般进步学生还是愿意参加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投机分子多一些。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组织

都在发展，国民革命军也已到武汉。我们学校里，冯温、刁孟申去武汉参加了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候已是 1926 年了。

然而，1927 年的形势却急转直下，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后来，阎锡山响应蒋介石的主张，成立“革命”队伍。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后，也向国民党妥协，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内战仍在继续。面对这一状况，我党决定搞武装斗争，红军在南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展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继续北伐，不过，这已经失去原先的意义，而且目的也不同了。北方一些省份里，国民党还没被搞臭，像在河北省冀东发生过武装起义。不少县的共产党人还想利用国民党进行活动。当时国民党搞清党、登记，我们县决定党员参加国民党，然后组织农协，组织小学教员协会，很快地我们如愿以偿。但这时，也有两个党员陈国民和张登五，他们参加登记后，离共产党越来越远，显示出拉势力、搞金钱的趋向，最后完全决裂。后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文件，决定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不搞跨党组织，我们县里支部当众宣布了国民党十大罪状，正式脱离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到了第四师范，我们仍是一方面搞学运，另一方面与各县联络，建立各县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在学校里，我仍是作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权